

Title	所謂 'Tumshuqese' 文書中の 'gyāzdi-'
Author(s)	榮, 新江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7 p.1-p.12
Issue Date	1992-05
oaire:version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19028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所謂 ‘Tumshuqese’ 文書中的 ‘gyāzdi-’

榮 新 江

1. 文書的發現和研究

早在1873年，英國派往新疆葉爾羌的 T. D. Forsyth 使團，就注意到了圖木舒克 (tumshuq) 的古代遺址。⁽¹⁾ 1895年走訪該地的 Sven Hedin，也記錄了這裏的古代廢墟。⁽²⁾ 正是在他們的記錄的啟發下，P. Pelliot 於1906年10月，率中亞探險隊到達這裏，正式對該地區脫庫孜薩來山 (Toqqouz-saraï-tagh) 南麓的城址和圖木舒克山 (Toumshouq-tagh) 南麓寺院遺址進行發掘，獲得公元4世紀末到7世紀初總共4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30件婆羅謎文文書和10餘件漢文文書。⁽³⁾ 1913年，A. von Le Coq 率領的普魯士探險隊再次發掘了圖木舒克遺址，所獲文物有152箱之多，其中包括10餘件婆羅謎文文書。⁽⁴⁾ 此外，通過挖寶人之手，至少有一件寫本落入英國的中亞古物收集者 A. F. R. Hoernle 手中，現藏印度事務部圖書館。⁽⁵⁾ 1928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黃文弼，也走訪了該遺址，並發掘了屬於7世紀前後的墓葬，獲得一些婆羅謎文文書和錢幣。⁽⁶⁾ 1958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再次發掘了脫庫孜薩來古城址，獲得4世紀末到11世紀初大量的文物和文獻資料，據稱其中包括吐火羅文、漢文、迴鶻文和阿拉伯文文獻。⁽⁷⁾ 可惜迄今尚未公佈。

圖木舒克遺址出土的這些婆羅謎文資料，給語言學家提出了新的課題。但是，由於這種「死文字」材料很少，比起其東部流行的吐火羅語和其南部流行的于闐語，研究起來難度更大。1935年，S. Konow 刊佈了 Le Coq 帶回的7件圖木

-
- (1) T.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and in 1873, Calcutta 1875, p. 54.
 - (2) S. Hedin, Durch Asien Wüsten, I, Leipzig 1899, pp. 298-299.
 - (3) M. Paul-David, M. Hallade et L. Hambis, Toumchouq (Mission Paul Pelliot, II), Paris 1964.
 - (4) A. von Le Coq, 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Leipzig 1928, pp. 39-43; idem,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Berlin 1925, pp. 27-33.
 - (5)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I, London 1960, pl. XXI.
 - (6)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1958年，59-61頁。
 - (7) 李遇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概況」，《文物》1962年第7、8期；穆舜英等《新疆考古三十年》，烏魯木齊，1983年，21頁。

舒克出土文書和 1 件吐魯番木頭溝 (Murtuq) 出土的同種文獻，初步解讀了這種新見的語言，並盡可能地做了轉寫譯注⁽⁸⁾。同年，在羅馬召開的第 19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Konow 概要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予會的 Pelliot 的注意⁽⁹⁾。Pelliot 把自己在圖木舒克發現的一件同種寫本交 Konow 研究。1941 年，Konow 刊佈了這件編號為 P410 的佛教文獻，並把這種語言看作是于闐語的變體⁽¹⁰⁾。1947 年，Konow 重新研究了德、法所藏 7 件文書和 2 件佛教文獻，對每件寫本都重新做了轉寫和翻譯⁽¹¹⁾。Konow 確定了這種語言的塞語或稱伊朗語的性質，並解讀了一大批詞彙，為人們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把這種語言看作是古老的于闐塞語方言，顯然祇是從其與于闐語的密切關係來立論，而忽視了它們都出土於圖木舒克這一基本事實。

1950 年，H. W. Bailey 參考巴利、梵、漢、藏、吐火羅語資料中的羯磨類文獻，確定了 P410 寫本是比丘尼所用的「羯磨儀軌」，並做了新的譯注。另外，他否定了 Konow 用于闐語指稱這種語言的作法，而改用地名 'Tumshuq'⁽¹²⁾。1957 年，Bailey 分析了這種語言的語法因素，並轉寫翻譯了一件文書⁽¹³⁾。1960 年，Bailey 在所編 Saka Documents I 中，刊佈了藏於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柏林科學院的 3 件新發現的圖木舒克文獻⁽¹⁴⁾。1968 年，他轉寫了這 3 件寫本，並確定印度事務部藏卷的內容是 Araṇemi Jātaka⁽¹⁵⁾。此後，Bailey 仍在文章和所編《于闐塞語詞典》⁽¹⁶⁾中引證或釋讀一些詞彙。

(8) S.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 Berlin 1935, pp. 1-54.

(9) S. Konow, "A New Saka Dialect", Actes du XIX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Roma 1940, pp. 231-232.

(10) S. Konow, "Notes sur une nouvelle forme aberrante du khotanais", Journal Asiatique, 233, 1941-1942, pp. 83-104.

(11) S. Konow,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XIV, 1947, pp. 156-190.

(12) H. W. Bailey, "The Tumshuq Karmavācanā",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I. 3, 1950, pp. 649-670.

(13) H. W. 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IV Bd., Iranistik, 1, Linguistik, Wiesbaden 1958, pp. 131-154.

(14)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I, London 1960, pls. XXI-XXIV.

(15)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pp. 44-51.

(16) H. 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1971年, R. E. Emmerick 在編輯 Saka Documents V 時, 收入東柏林民主德國科學院藏的 3 件未刊文書。⁽¹⁷⁾ 1985年, Emmerick 根據 H. Härtel 刊佈的梵本「羯磨儀軌」,⁽¹⁸⁾ 重新轉寫翻譯了 P410, 參照梵文對應詞彙, 確定了一些詞的含義。在該文中, Emmerick 首次使用 ‘Tumshuqese’ 一名作為這種語言的名稱。⁽¹⁹⁾ 此名已基本得到伊朗語學界的認可。儘管 Emmerick 在「羯磨儀軌」的研究上前進了一步, 但他並沒有找出 Tumshuqese (以下簡稱 Tumsh.) 譯本和梵本間的全部對應關係。1987年 P. O. Skjaervø 又細心地對證出一些 Tumsh. 「羯磨儀軌」的語義, 訂正了 Emmerick 的一些錯誤; 在文末, 他還轉寫了 Saka Documents V 中刊佈的 3 件文書, 並討論了 Tumsh. 文書中幾個特有的字母。⁽²⁰⁾ 最近, K. T. Schmidt 根據吐火羅語資料來訂正 Emmerick 的刊本, 認為 Tumsh. 「羯磨儀軌」實際是譯自吐火羅語本。而且他還在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找到 1 件未刊 Tumsh. 寫本, 內容尚未判定。⁽²¹⁾

另一方面, D. Hitch 在多處探討了 Tumsh. 所用婆羅謎字母與中亞的摩尼文、佉盧文、突厥語所用婆羅謎文的關係。但他關於 Tumsh. 所用字母來源於突厥語所用者的假說, 與歷史事實全違, 因而受到另一位專治中亞文字的學者 L. Sander 的批評。⁽²²⁾ 然而, Hitch 用與于闐語、⁽²³⁾ 尼雅俗語同類語句對比的方法, 來確定 Tumsh. 契約文書中的懲罰語句含義,⁽²⁴⁾ 卻是研究文書類資料的一種可行

(17) R. E. Emmerick, Saka Documents, V, London 1971, pls. CXXII-CXXVI.

(18) H. Härtel, Karmavācānā, Berlin 1956.

(19) R. E. Emmerick,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ānā Text, Stuttgart 1985.

(20) P. O. Skjaervø, “On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ānā Tex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7, pp. 77-90.

(21) K. T. Schmidt, “Ein Beitrag des Tocharischen zur Entzifferung des Tumshuq-sakische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5, 1988, pp. 306-314.

(22) D. Hitch, “A Brāhmī-Manichaean Hybrid Script”, Orientalia Lovaniensia Periodica, 14, 1983, pp. 293-312; idem, “Kharosthi Influences on the Saka Brāhmī Script”,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n 1984, pp. 187-202; idem, “Tumshuqese and Turkic Brāhmī script”,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1, 1987, pp. 249-252; idem, “Brāhmī”, Encyclopaedia Iranica, IV, 4, 1987, pp. 432-433.

(23) L. Sander, “Brāhmī Scripts on the Eastern Silk Roads”,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11/12, 1986, pp. 163-166.

(24) D. Hitch, “Penalty Clauses in Tumshuqese, Khotanese and the Shanshan Prakrit”, Studia Iranica, 17.2, 1988, pp. 147-152.

辦法。據聞，他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就是重刊已知的所有 Tumsh. 文獻。⁽²⁵⁾

筆者所見有關 Tumsh. 的最新研究成果，是 Emmerick 的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該文分析了 Tumsh. 的字母、語音、語法等，⁽²⁶⁾可視為今後研究的基礎。

總結上述研究成果，迄今共刊佈了15件 Tumsh. 文獻。除 P410 外，其他文獻由 Skjaervø 編為 Tum. I-XIV。其中 Konow 最早刊佈的8件中，Tum. I-VI 是法律契約類文書，Tum. VII 可能是摩尼教團的文書。木頭溝出土的 Tum. VIII 是佛教文學作品；Saka Documents I 中刊佈的3件中，Tum. IX 是 Araṇemi Jātaka，Tum. X-XI 是文書；同書V所刊3件，Tum. XII-XIV，均為文書。這些寫本大致可分成兩類，即佛教文獻和世俗文書。前者均用正體婆羅羅文書寫，後者則用草體。P410 顯然最古老，它所使用的字母與梵文不盡相同，並有一個表示 ž 音的特殊字母。在世俗文書中，更較梵文多出12個字母，其中7個也見於吐火羅語和突厥語所用的字母，其餘5個則為 Tumsh. 特有，這比與之最親近的于闐文所用字母還要多。⁽²⁷⁾但是，語言學者并未能根據這些特點來確定出寫本的年代，而往往籠統地稱 Tumsh. 是比于闐語更為古老的塞語方言。至於文字的解讀，除「羯磨儀軌」和 Araṇemi Jātaka 外，文書的詞字尚有許多不明點，前人的解讀、翻譯只能提供大致的意思，有些詞彙的解釋值得商榷。

2. 圖木舒克地區的歷史沿革

圖木舒克位於新疆巴楚（Barcuq）縣東北，有關該地區佛教時代的歷史狀況，以漢文史料記載最為詳實。以下簡要分析一下漢籍中的記錄，以便確定 Tumsh. 文書所處的時代。

圖木舒克地區漢代時應在尉頭國的範圍之內。《漢書》卷96上西域傳記載：

(25) D. Hitch, *Tumshuqese Materials: a (re) edition of the available texts.*

(26) R. E. Emmerick,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ed. by R. Schmitt, Wiesbaden 1989, pp. 204-229.

(27) *Ibid.*, pp. 206-207.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同傳下溫宿國條記：「西至尉頭三百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據此，知西漢時尉頭為隨水草而動的游牧小國，中心地帶在山谷中，從山道不與疏勒通的記載，推測當在圖木舒克以北山中。但從其與溫宿等國間的距離和道路相通來看，圖木舒克地區當在尉頭國民的游牧範圍之內。這可以從《後漢書》卷88西域傳中得到證明：「疏勒國……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表明尉頭位在疏勒、溫宿之間的路上，亦即今巴楚地區。

尉頭雖為獨立王國，但人少勢單，夾在疏勒、龜茲兩大王國之間，主要依附於後者。《後漢書》卷47班超傳記永平十八年（A. D. 75）班超奉命回中原未果，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同傳又記：「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表明尉頭在東漢初已在龜茲的指揮之下。《三國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傳》記：「中道西行……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併屬龜茲也。」此後尉頭仍以王國形式存在。《晉書》卷122《呂光載記》記呂光進攻龜茲城事：「光攻城既急，〔龜茲王〕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於獯胡。獯胡弟訥龍、侯將廋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北史》卷97西域傳稱尉頭國「役屬龜茲」，用詞似更貼切。

隋唐時期，不見尉頭國的明確記載。《通典》卷191邊防七記：「龜茲，今併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唐高宗顯慶三年（658）打敗西突厥，全面控制西域以後，在西域地區實行羈縻州制度，並保留原有的當地國王管理體制。此後，圖木舒克地區更多地是以「據史德」的名字出見在唐朝的文獻中，而「尉頭」則用為唐朝所設羈縻州名，歸龜茲都督府管轄。對此記載最詳的是《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所錄賈耽的《皇華四達記》：「自撥換（漢姑墨，今阿克蘇）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干城，百二十里至謁者

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菟盧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于城東北，入據史德界。」同志所記隸屬安西都護府的羈縻州中，也有「蔚頭州」名。「鬱頭」、「蔚頭」，都是「尉頭」的同音異寫。「據史德」一名，又見於吐魯番出土的兩件唐麟德二年（665）「府兵支用錢練帳」⁽²⁸⁾、和田麻札塔格（Mazar tagh）出土的一件唐代殘文書中。⁽²⁹⁾這些不同地區出土的唐代文書均用「據史德」這種寫法，證明賈耽所據的資料是唐朝的官府文書，十分可信。前人早已指出，赤河指今喀什噶爾河。孤石山或即今脫庫孜薩來山，據史德城即今山南麓的古城遺址，當地百姓稱之為唐王城。知唐代的據史德城即在今圖木舒克。另外，賈耽所記據史德城位於撥換到疏勒路上，正與漢代尉頭位於姑墨、疏勒之間相合。這一點還可參看《舊唐書》卷104《高仙芝傳》的記載：「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城，又十餘日至疏勒。」「握瑟德」即「據史德」（「握」為「據」的誤寫，「瑟」為「史」的同音異譯）。此名在漢籍中最晚見於《悟空入竺記》，其所記悟空於貞元四年（788）的回程云：「次〔至〕據瑟德城，〔鎮守〕使賣訖。⁽³⁰⁾次至安西。」此後不久，唐朝勢力退出西域，此地可能經過吐蕃的短暫統治，而後歸入葛羅祿或迴鶻人的勢力範圍。到11世紀後半黑韓王朝學者馬合木·喀什噶里編《突厥語大詞典》時，這一帶已經用突厥語稱作「巴楚」（Barchuq）。從圖木舒克遺址出土有回鶻文、阿拉伯文文書來看，⁽³¹⁾據史德城仍未廢棄，但政治中心恐怕已西移巴楚。

從以上的歷史概述，大致可以了解尉頭／據史德從遊牧到定居的生活形態，從役屬於龜茲到成為龜茲管內羈縻州的政體變遷。這些對於我們正確地理解 Tumsh. 文獻的內涵及其文化來源，都有着極其重要的價值。

(28)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北京，1985年，434-437頁。參看拙稿「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西域史事二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輯，北京，1990年，345-354頁。

(29)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 188; No. 459.

(30) 《大正新修大藏經》No. 2089, p. 980c.

(31) 沙比提·阿合買提「喀喇汗朝時期的一件文書」，《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80-81頁。

3. 所謂 Tumshuqese 文書中的 gyāzdi- 即「據史德」說

一般說來，這些出土於圖木舒克的文獻，特別是其中的世俗文書，所記必然是當地之事。然而，語言學者們迄今並未在這些文獻中找到佛教時代的「尉頭」或「據史德」的原語，因此在指稱這種語言時，祇好用很晚才有的‘Tumshuq’一名來作為這種語言的名稱，但‘Tumshuqese’一名無論在已刊的文書中，還是在同時代的其他文獻里都沒有得到印證。從于闐語、粟特語等古代語言的命名方法來看，應盡可能地使用這種語言流行時期該地區的地名來命名，‘Tumshuqese’的命名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Tumsh. 文書中是否包含人們目前尚未發現的當地地名呢？這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 Tumsh. 文書開頭部分的紀年語句，現將 Tum. I 第 1-2 行轉錄如下：

- (1) jezdam-purā xšande gyāzdiyā riḍ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
zdā (2)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Bailey 的英譯是：

On the 23rd day of the month Ahverjana, in the Serpent year,
in the sixth regnal period of Wāsudewa, son of the gods, ruler,
divine king.⁽³²⁾

Bailey 此處把 jezda-和 gyāzdiya-分別譯作名詞‘god’和形容詞‘divine’，含義都是「神」。這一解釋當承自 Konow。Konow 把這兩個詞分別比定為于闐文的 gyasta-‘god’和 gyasta > *yāzyata ‘divinity, majesty’⁽³³⁾。這種解釋顯然是根據發音都略同於于闐文的 gyāsta-「神」而得出的。但是，在同一行中表示同一個修飾語義時不應該使用不同的字。對於 jezda-和 gyāzdi-，有必要做新的探討。

實際上，gyāzdi- (-ya 是形容詞尾) 中的 z 是僅見於 Tumsh. 文書中的特殊字母，在 Konow 最早刊佈的字表中被認為是 No. 4. Skjaervø⁽³⁴⁾ 指出，合體字

(32) 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s”, p. 152.

(33) Konow,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p. 183.

(34)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p. 7.

žda 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把 gyāždi- 看作是國王的一種榮譽稱號是有疑問的，Konow 和 Bailey 認為是 No. 4 的 ž 很可能是 No. 8 的 ž⁽³⁵⁾。Emmerick 在對比于闐語和 Tumsh. 詞匯時，也只將 jezda- 對應於 gyasta- 「神」，而沒有提 gyāždi-⁽³⁶⁾。可見，把 gyāždi- 解釋為「神」是有疑問的。

我在此提出 gyāždi- 即地名「據史德」的假說，換句話說，即漢文「據史德」的原語就是 gyāždi-，理由如下。

從語音上來看，gyāždi- 和「據史德」的古音基本相合。「據史德」的中古音可以擬為 *kio-ſiə-tək⁽³⁷⁾，下引藏文史料中「據史德」的拼法是 gus-tig。第一個字的韻母 ā，在于闐文的語音發展中是向 o, au 轉化的，如晚期于闐文 (LKH) noma, nauma 即早期于闐文 (OKH) nāma 「名」，ā 在 LKH 中也常用來譯外來語的 o，如 dārji 譯自藏文 rdo-rje⁽³⁸⁾。水谷真成氏曾據婆羅謎文轉寫之《金剛經》，指出于闐文的 ā 通常近於 u 或 o 的音。現代波斯文中的長音 ā，讀音時也類似漢語拼音的 ao 的音。所以，唐人用「據」來轉寫 gyā 是可以講的通的。ž 是發聲的絲音，譯成「史」是沒有問題的。di- 中的 -i- 可能是構形成容詞的聯結元音，其原形韻尾有可能是一個短元音 a 或 o。上舉婆羅謎文音譯漢字《金剛經》中用 ttiḥā: 譯「德」字，十世紀于闐國太子 tcūṃ-ttehi:，漢文作「從德」，又于闐文文書中有 thaiyaṃ ttikā 「大德」、kū thaigā ṣī 「功德使」⁽⁴⁰⁾。此處之 di- 無收聲，或許是因為後接形容詞尾 -ya 的緣故。另外，據史德的古名尉頭，一作鬱頭，中古音可擬為 *iwət-dəo⁽⁴¹⁾，應當與據史德來自同一個詞，「頭」無收聲，可以作為參考。

漢文之外的「據史德」一名，見於 F. W. Thomas 刊佈的藏文文獻《Sang-

(35) Skjaervø, "On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p. 79.

(36) Emmerick,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p. 222.

(37)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1985年，115、56、22頁。

(38) R.E.Emmerick, "The Vowel Phonemes of Khotanese", *Studies in Diachronic, Synchronic and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for Osdwald Szemérenyi*, ed. by E. Brogyanyi, Amsterdam 1979, pp. 245, 239.

(39) 水谷真成「Brāhmī 文字轉寫《羅什譯金剛經》的漢字音」，《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記念論集》，1959年，751頁。

(40) 高田時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1988年，76，78，89頁。

(41) 《漢字古音手冊》，114，176頁。

havardhana 授記》中：

Likewise also the monks of 'An-tse, Gus-tig, Parmkhan, and Śu-lig,
after great sufferings, will go to the Bru-śa land.⁽⁴²⁾

其中的地名，已由 Pelliot 圓滿地比定出來，即：'An-tse <安西（龜茲），
Gus-tig <據史德，Par-mkhan <撥換，Shu-lig <疏勒。⁽⁴³⁾藏文 Gus-tig 一名來自漢文，其形式可作為上述比定的參證。

另外，從西域流行的伊朗文化系統的文書紀年形式來看，也可以把 *gyāzdi-* 看作是「據史德」。一般來講，在文書紀年部分往往要講明是何國之王的哪一年，即「王」字之前都舉出地名，現舉證如下：

(A) 安德悅 (Endere) 遺址出土的佉盧文 No. 661 契約文書紀年部分：

samvatsara 10 mase 3 dhivajha 10 4 4 ij'a ch'unami khotana ma-
haraya hinajha dheva vij'ida simha⁽⁴⁴⁾

T. Burrow 的英譯是：

On the 18th day of the 10th month of the 3rd year, at this time in
the reign of the king of Khotan, the king of kings, Hinaza Deve
Vijita-Simha⁽⁴⁵⁾

(B) 和田鐵提克日木遺址（即 Farhad-beg-yailaki）出土于闐文契約文書紀年部分：

sali 4 māsta 2 haḍa 5 ṣa' kṣuṇā miṣḍā gyasta hva [nā] rrāṃda viśa'
simhyi

Emmerick 的英譯：

Year 4, month 2, day 5. the regnal year of the gracious divine Kho-

(42) F. W. Thomas,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 London 1935, p. 61.

(43)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I, Paris 1963, pp. 713-715.

(44) 除 Emmerick 在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 p. 168, n. 7 中所列舉的參考文獻外，又見 H.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 p. 2.

(45)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 137.

tanese king Viša' Sīmhyi.⁽⁴⁶⁾

(C) Mug 山遺址出土粟特語文書紀年部分：

'LKŠNT 'YKZY ZKn sγwδyk MLK' sm'rknδc MR'Y δyw'styc 'yw
ŠNT "z m'xy zyntytcy

F. Grenet和N. Sims-Williams 的英譯：

That year when it was the year one of the Sogdian king, the lord
of Samarkand Dēwāštič, in the month Žimtič⁽⁴⁷⁾

以上三種文書，分別用和田地區的佉盧文健陀羅語、于闐語和粟特語書寫，它們無疑與 Tumsh. 最為親密，在「大王」(maharaya) 或「王」(rrāmda. 或 MR'Y) 之前，無一例外的是地名 (khotana/hvanā 「于闐」或 sm'rknδc 「撒馬爾干」)，由此我們認為 Tumsh. ride 「王」字前面的 gyāzdi- 應是地名，即「據史德」，Tum. I 第 1-2 行應譯作：

神之子、統治者、據史德王 Wāsudewa 在位第六年、蛇年 Ahverjana 月二十三日

The 6th regnal year of the son of the gods, ruler, Gyāzdesē king
Wāsudewa. Year Serpent, month Ahverjana, day 23.

最後，還可以從文書的大致年代提出佐證。如上所述，語言學家迄今并未能判定出這些文書的年代。文書材料所用的字母較明確屬於唐朝時期的于闐文所用字母還多，似表明其年代不會太早。Sander 把 Tumsh. 的文字歸入 'North Turkestan Brāhmī, type a or b'，並且認為應來自吐火羅文所用之文字，較五、六世紀的 'Early Turkestan Brāhmī'⁽⁴⁸⁾ 年代要晚。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文書，大致可以將它們判定在 658 年唐朝據有塔里木盆地以後的時代，理由有

(46) R. E. Emmerick, "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 *Studia Iranica*, XIII. 2, 1984, pp. 194-195. 于闐文的其他例證，見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東洋學報》69-1.2, 1988年，65, 78頁。

(47) F. Grenet and N. Sims-Willia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Studia Iranica*, cahier 5), Leuven 1987, p. 114.

(48) Sander, "Brāhmī Scripts on the Eastern Silk Roads", pp. 163-166.

四：第一，在 Tum. I 和 II 兩件文書中，都有漢字署名，一個字似「倪」，一個似是「庭」，從字形、筆劃來看，似不是漢人所寫，而是當地胡人所書⁽⁴⁹⁾。之所以用漢文簽署，應是漢人統治該地的結果。Tum. I 和 V 兩件文書，都是經過 cāmsi 處理的法律文書⁽⁵⁰⁾，Konow 已經比定出 cāmsi 即漢文的「長史」⁽⁵¹⁾。由長史判案處理民間訴訟等問題，正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制度⁽⁵²⁾，而這種行政制度是隨着 658 年唐朝佔領西域並設立羈縻州後傳到西域地區的。在此之前，沒有證據說明有長史這樣的官在西域地區處理類似本文書所涉及的這種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文書產生於唐代。第二，Tum. I-IV 文書都有畫指，即先寫自己的名字，再寫多少歲，在表示年歲的部分，劃三個橫線，表示指節。在中國歷史上，署名畫押早在漢代就有了，但畫指和書年相結合的形式，是唐朝時期纔見於文書的⁽⁵⁴⁾。Tumsh. 文書的畫指書年形式，當得自唐朝或唐朝影響下的吐火羅語文書形式⁽⁵⁵⁾，故其年代不應早於唐朝。第三，Tum. II、IV 兩件文書中提到的保人中有粟特人（Sudani）⁽⁵⁶⁾。粟特人大批東來並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周邊緣州、吐魯番、敦煌等地，應是公元七世紀初以來的事，粟特人（唐人稱之為興胡）為人擔保的事例，見於多件吐魯番出土唐代文書中⁽⁵⁷⁾。第四，在圖木舒克遺址出土文書中，除上述 Tumsh. 文書外，有兩件漢文文書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展出，均為 1958 年的發掘品。其一已由山本達郎和池田溫氏發表，題「唐年次未詳（8 世紀）龜茲白向宜黎租桃園契」，文字如下：

(49)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Taf. 1-2.

(50) *ibid.*, pp. 33-36, 40-41.

(51) *ibid.*, p. 4.

(52) 《唐六典》卷 30。

(53) 拙稿「唐宋時代于闐史概說」，《龍谷史壇》97，1991 年，29-32 頁。

(54) 張傳璽「中國古代契約形式的源與流」，《秦漢問題研究》，北京，1985 年，183 頁。

(55) Tumsh. 中表示「畫指」的特殊詞 Kapci 系借自吐火羅文，而不是用伊朗語的 hamgusta- (Emmerick,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p. 229)。此點至堪注意。關於此詞詞義，參看熊本裕「hagausta. sūli」，《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17，1984 年，1-5 頁。

(56) Konow,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pp. 165-166, 168-169. Cf. W. B. Henning, "Neue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aismus",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936, pp. 389-391.

(57) 池田溫「8 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1965 年，28-52 頁；姜伯勤「敦煌、吐魯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東西交渉》5：1-3，1986 年，30-39，26-36，28-33 頁；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 年第 2 期，71-82 頁。

- 1 (前缺) 蒲桃園壹所
 - 2 (前缺) 七日，白向宜黎為自無田
 - 3 (前缺) 平章，兩家火下
 - 4 (前缺) 白向宜黎出人力，至
 - 5 (前缺) 已上並停(庭)分。官有
 - 6 (前缺) □□稅糧並向宜
 - 7 (前缺) 多
- (58)
(下缺)

另一件館方題為「唐殘牒」，現將筆者1983年參觀該館時所錄文字抄下：

(上殘)

- 1 審思之，秋中(後缺)
- 2 動履清適，庭(後缺)
- 3 欲和同，何得有少(後缺)
- 4 聽，亦無此言，望知(後缺)
- 5 昨得守捉申稱，補爾(後缺)
- 6 葉護與爾界舊有言(後缺)
- 7 得否，請與董使審(後缺)
- 8 各限公守(後缺)
- 9 遣將軍(後缺)

(下缺)

從「守捉」一詞，可知應系唐朝文書。由這兩件漢文文書，亦可佐證 Tumsh. 文書類資料同屬唐代，即七、八世紀。在屬於唐朝時期的 Tumsh. 文書中，應當有「據史德」一名，這是我們之所以判斷 gyāzdi- 為「據史德」的另一原因。

如果 gyāzdi- 為「據史德」的比定成立的話，那麼所謂「Tumshuqese」似應改稱 Gyāzdeese 「據史德語」。

(58) T. Yamamoto and O. Ike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A), Tokyo 1987, p. 166

(附記) 謹在此向對此文提出過批評指正的 YTS 成員森安孝夫、高田時雄、武內紹人、吉田豐諸氏和王小甫博士表示感謝。